

《金刚经十七家释义》之编纂者杨圭考

——从朱棣《金刚经集注》之仙游翁说起

卢翠琬^{1,2}

(1.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闽江学院学报编辑部,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朱棣《金刚经集注》开篇经题下首个注为“仙游翁集英曰”。这一“仙游翁”就是《金刚经十七家释义》的编纂者南宋浦城人杨圭。“集英”二字,并非人名,而是“集群英之言”。通过爬梳相关史料,杨圭的名号、生卒年、科考、宦迹等生平事迹基本得以理清。杨圭以儒家为根基,同时又崇奉释、道两家,这种思想格局体现了宋代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时代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编纂的《金刚经十七家释义》。

关键词: 杨圭 《金刚经十七家释义》;《金刚经集注》;仙游翁;真德秀;周史卿

中图分类号: K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821(2018)03-0017-08

Research on Yang Gui, the Editor of *Diamond Sutra 17 Interpretation*

——Starting with Xianyouweng of Zhu Di's *Diamond Sutra Variorum*

LU Cuiwan^{1,2}

(1.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2. Department of Journal Editorial,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annotation under the title of the opening verse of Zhu Di's *Diamond Sutra Variorum* is “Xianyouweng Jiying Yue”. This “Xianyouweng” is Yang Gui, an editor of *Diamond Sutra 17 Interpretation* in Pucheng,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word “Jiying” is not a name, but a cluster of the wonderful comments. By combing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Yang Gui's name, year of his birth and death, imperial examinations, official history and other life stories can be basically clarified. Yang Gui is based on Confucianism, and worships both Buddhism and Taoism at the same time. This ideological pattern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Song Dynasty. To a large extent, it also affected the compilation of *Diamond Sutra 17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Yang Gui; *Diamond Sutra 17 Interpretation*; *Diamond Sutra Variorum*; Xianyouweng; Zhen Dexiu; Zhou Shiqing

近年来学界所见之《金刚经》注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明朱棣编《金刚经集注》最为流行(2011年重印),该本系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永乐内务府刻本影印。此《金刚经集

收稿日期: 2018-03-25

作者简介: 卢翠琬(1984-),女,福建龙海人,2016级博士研究生,编辑,主要从事中国佛教文学、编辑学研究。

注》，又称《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俗称《金刚经五十三家注》。注本中所收录的注家之多，关涉人物之驳杂，在众多集注本中至为罕见，但其中有不少注家甚是陌生，给阅读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目前根据该本点校出版的诸多书籍，都只是进行标点，未进一步做注释。李艺敏的硕士学位论文《朱棣〈金刚经集注〉之注家研究》专门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这些注家进行了梳理，但仍存在不少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所涉及的对象仙游翁就是其中一例。

《金刚经集注》开篇经题下首个注为“仙游翁集英曰”，这一仙游翁究竟是何人，截至目前尚未有人做过专门研究，本文将对这一人物进行细致的考证。

一、仙游翁与杨圭

笔者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诗文中有两处提及仙游翁。其《寿外舅杨开国》诗云“堂堂玉立仙游翁，岁比磻溪未华首。”^①卷一又《七峰行为外舅寿》诗曰“仙人冠剑端且凝，仙源万叠秋空横（仙源谓余婆山，以仙游山水之所自出，故立今名以正此山之称谓）。……百年山川久寂历，人物今有仙游翁。”^②卷一“外舅”是岳父的另一种称呼。《尔雅·释亲》云：“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③由此可知，真德秀的岳父杨开国有仙游翁之雅号，且该雅号与其乡邦之仙游山水有关。

关于真德秀的岳父，据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载：（真德秀）配建安郡夫人杨氏，大中大夫圭之女。^④卷一六八魏了翁《真公神道碑》载“同郡杨国瑞圭……以女女之。”^⑤《宋史》“真德秀传”曰“德秀，字景元……十五而孤……同郡杨圭见而异之，使归共诸子学，卒妻以女。”^⑥2958由此可知，真德秀的岳父杨圭，字国瑞，号仙游翁，曾受封开国男（详见下文），翁婿二人同为浦城人。至此，杨圭有仙游翁之雅号已经可以确定。

但是，这个真德秀外舅仙游翁是否即朱棣本《金刚经集注》的仙游翁，这就要进一步梳理朱棣所编之《金刚经集注》与杨圭编纂的《金刚经十七家释义》（或称《十七家解注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解》）的关系。《金刚经集注·出版说明》中说“《金刚经集注》，原有南宋绍定杨圭十七家释义四卷，后演为五十三家注四卷。明御纂本摒除五十三家本中传为梁昭明太子所作三十二分目，略减注者数家，而益以三十余种经文或注文，裒成一卷。”^⑦李艺敏《朱棣〈金刚经集注〉之注家研究》根据杨圭《十七家解注金刚经姓号目录》，将朱棣本注家和杨圭本注家姓名进行了对比，发现朱棣本只是比杨圭本多了唐玄宗和李文会两家，且明刻本杨圭辑《十七家解注金刚经》首页“仙游翁集英曰”的内容与朱棣本完全一致。因而李艺敏认为“朱棣的《金刚经集注》可能是以杨圭的《十七家解注金刚经》为底本，并在其基础上增加唐玄宗和李文会两个注家的注条而成。”^⑧笔者在此基础上找到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题为宋杨圭编的《十七家解注金刚经》和台湾图书馆所藏的宋杨圭编、明戚继光校刊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解》。通过逐条比对杨圭本与朱棣本之注文可知，朱棣本确是以杨圭本为底本进行重编，且开篇对于经题的解释，二本所引之仙游翁、陈雄、颜丙三家内容皆一致，而朱棣本在此基础上又增入了李文会、川禅师两条注文。

据国家图书馆所藏之《十七家解注金刚经》卷末所载旧本序跋可知，杨圭本之经文以寿春永庆寺南唐道颢法师石本为正，注文内容由杨圭与潘舜卿同编，编定后由其子杨宗元校正，采用三样字刊刻印行。元至元年间廖鼎重刊此书，永乐九年（1411）再刊（王汝贤序），嘉靖四十年（1561）学易山人又刊，改套卷为书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就是这个刻本。此版本开篇为杨圭所作之序，序之署款为“绍定辛卯长至日太中大夫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致仕杨圭

谨识”^[8]。编者杨圭的爵里官职等与真德秀外舅杨圭完全一致(详见下文)。根据以上材料可以推断仙游翁就是辑《十七家解注金刚经》的真德秀外舅杨圭,也就是朱棣本《金刚经集注》所用之底本的编者。作为杨圭自己编选的注本,编者在开篇先做一概括性的注解应该是合乎常理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金刚经集注》经题下的第一个注条之仙游翁就是南宋浦城人杨圭,而仙游翁后的“集英”二字,应该不是人名,乃是“集群英之言”的意思。因为“仙游翁集英曰”之条目后,便是冲应真人周史卿及陈雄、颜丙的注,说明杨圭乃是集取这几家的注来注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一经题。杨圭在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中说道“此一卷经,穷乡委巷,匹夫匹妇,人人受持诵念,叩其理义,懵然不知下落。今掇拾诸解之英华,因其所向而顺导之,使人知佛之行。”^[9]“掇拾诸解之英华”即“集群英之言”的意思。另,此处的“冲应真人周史卿作《杨亚夫真赞解》云”乃杨圭之引文,不能算一单独的注家,这留待后文考证。

二、杨圭生平考证

杨圭的生平资料留存极少,史志中鲜有记载,学界也未对其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许明编著《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宋辽金元卷)在杨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前有其简短介绍“杨圭,宋绍定间人。官至大中大夫。深契禅旨。”^[10]林日波在《真德秀年谱》中写到真德秀妻杨氏时对杨圭有一些考证^[11];另外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之第一章“真德秀的学术背景”中有对杨圭的简要介绍^[12]。兹据笔者目前检索到的有关资料,略作简介如下:

其一,关于杨圭的名号。据前文可知,杨圭,字国瑞,号仙游翁,浦城^①人,受封开国郎。

其二,关于杨圭的生卒年。真德秀《己丑外舅生日设醮青词》说“将耆而耄,倏邻八袞之期;既寿且康,冀锡九畴之福。”^{[13] 806}《庚寅外舅设醮青词》说“老将至而耄违,常切寅威之念。”^{[13] 807}《辛卯外舅设醮青词》说“伏以无德而寿,倏开九袞之期;不劳而官,将冒三阶之宠。”^{[13] 807}真德秀生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卒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享年58岁。在此期间,己丑、庚寅、辛卯分别对应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三年(1230)、四年(1231)。“袞”,即秩,古人以十年为一袞,八袞为80岁,九袞为90岁,“临八袞”即临近80岁,“开九袞”即80岁以上^②。也就是说,在己丑年(1229)杨圭临近80岁,辛卯年(1231)杨圭超过80岁,那么在庚寅年(1230)杨圭为80岁。以此反推,杨圭应出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③,比真德秀大27岁。从真德秀的相关诗文中可知,翁婿二人关系极为亲密,但在真德秀的《西山文集》及后人所作的真德秀行状和年谱中,未见有关于杨圭去世的记载。据此推测,在真德秀去世时,杨圭仍然健在。也就是说,杨圭应去世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之后,享年85岁以上,经历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

① 关于杨圭的籍贯,因建置变迁,有浦城、建安、瓯宁几种不同记载。

② 陆游《自贺》诗曰“曾冠六鳌非俗吏,已开九秩是陈人。”钱仲联注曰“〔已开开〕八十岁以后,俗称开九秩。洪迈《容斋随笔》卷一:‘白公诗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注曰: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盖以十年为一秩云。司马温公作《庆文潞公八十会致语》云:‘岁历行开九秩新,亦用此也。’”(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676页。)

③ 林日波《真德秀年谱》根据《西山文集》卷四十九《附青词·己丑外舅生日设醮青词》“将耄而耄,倏邻八秩之期”之语“由己丑(1229)顺推八十年,知其生年当为绍兴二十年(1150)。”(林日波《真德秀年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13页。)与笔者稍有差异。另外,孙先英在《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之第一章“真德秀的学术背景”中写到杨圭时说“杨圭(1150—1229)名开国,字国瑞,建安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官至通判。一生屡遭弹劾、罢斥。”(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页。)其生卒年的来历不知何据。

理宗五朝。

其三,关于杨圭的科考。真德秀《代外舅谢丞相转官后》中说“某忝绍熙太学之诸生,溷庆元奉常之一第。”^[1] 卷三十九]可知杨圭宋光宗绍熙间(1190—1194)为太学诸生,宋宁宗庆元间(1195—1200)中进士。(雍正)《福建通志》卷三十五《选举三·宋科目》之庆元五年(1199)曾从龙榜瓯宁县有杨圭之名,其女婿真德秀亦于同榜。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载真德秀“擢庆元己未乙科……翁婿恩义甚笃,后同擢第。”^[2] 卷一六八]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浦城乡校芝草之瑞》条曰“庆元间……文忠真公遂登乙科,继中宏博,而其妇翁开国杨圭,亦同年第。文忠官至腰金,与妇翁所中科级略同,杨公亦至佩金。”^[3] 卷五]

其四,关于杨圭的宦迹。《四朝闻见录》丙集“方奉使”条记载“开禧间(1205—1207),文忠(真德秀)为学官,圭以三省枢密院酒官充书云。”^[4] 卷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五十四《名宦·台州府九》引万历《黄岩县志》载“杨圭,字国瑞,建安人。嘉定二年(1209)以奉议郎知黄岩县,修复经界,剏利涉桥,与唐守仲友同时,人称‘利涉之功,过于中津’云。”^[5]真德秀《七峰行为外舅寿》也说他“经界宽租惠最多。”^[6] 卷一]由于在黄岩县的突出政绩,杨圭终于得到朝廷的赏识而转官。真德秀喜出望外,特地写了《贺外舅转官》,诗云:

黄山桃李闹春风,曾见生生化育中。经界力行师孟子,井田有意复周公。几年凋俗成佳邑,一旦新纶赏旧功。明主已知材智美,渭川行起钓璜翁。^[7] 卷一]

然而,杨圭的仕途并未就此而一帆风顺,而是屡遭罢免,仕途坎坷。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载“嘉定五年(1212)三月二十九日,干办诸司粮料院杨圭放罢,以右正言董居谊言‘其昨宰黄岩,倚任群胥,交通关节’。”^[8] 5026]《职官》七五载“嘉定十年(1217)十一月五日,新知建昌军杨圭罢新任,以监察御史李安行言‘其凶险贪叨,得倖合肥,凌忽帅守’。”^[9] 5080]《职官》七五载“嘉定十二年(1219)十二月□日,新通判常德府杨圭、新通判郴州府赵汝璫并罢新任,以监察御史张次贤言‘二人者,居家有丑行,居官无善状,得倖名邦,未厌公论’。”^[10] 5084]前后六七年间,杨圭连续三次被罢免。

从有关资料看来,杨圭辞官的原因是在黄岩县期间推行赋税改革触犯了相关政党的利益,因而遭到谗言陷害。真德秀《代外舅制参谢丞相后》中说:

君子之学,贵在及人……然而患生于计虑之疏,祸产于语言之易,故赋籍之定,虽以惠穷氓,而有力者则尤其非便;郡政之冥,志于报公上,而当事者则嫉其多言,退循颠踣之由来,孰非愆冥之自取,不戮幸矣,求免得乎?^[11] 卷三十九]

真德秀《代外舅谢丞相转官后》又说:

自徒劳于州县,顾何有于智能。妄学弦歌,丁时凋瘵。以官民之交病,将革弊端;若谷禄之不平,孰为仁政。新版籍于片纸不存之后,复经界于历年久废之余。精神方耗于一身,怨谤已腾于众口。^[12] 卷三十九]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杨圭在任黄岩知县期间,眼见该县社会衰败不堪,子民贫困交加(即所谓丁时凋瘵),为革除弊端,施行仁政,他极力推行改革。杨圭的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并得到了当时丞相的赏识。由于丞相向朝廷举荐,杨圭获准转官。但他在黄岩县推行改革过程中,可

能侵犯到了相关政党的利益,故在其转官之后,顽固保守势力借机反扑,杨圭因此遭受到各种谗言陷害而沉浮宦海。所幸当时丞相极力周旋,杨圭感激不尽。

但据真德秀为杨圭七十大寿所作的《寿外舅杨开国》诗中所云“大中大夫汉千户,子男一位周诸侯。人生到此不易得,况复宝带悬精镠。”^[1]卷一“子男一位”指获得了“开国男”的爵位,而所谓“宝带悬精镠”应该就是真德秀《辛卯外舅设醮青词》中所说的“紫绶垂鱼之亦宠”。由此可知,在杨圭70岁的时候,即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他已就任大中大夫之职,且已获得“开国男”“紫金鱼袋”两大殊荣。杨圭就是从大中大夫的职位上致仕归里的,“太中大夫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致仕杨圭谨识”,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的这一署款应该就是据此而来的。

退隐乡里之后,杨圭开始在山水之间和日常生活中寻求精神的安顿。真德秀《代外舅谢丞相转官后》说“归逃空谷,细数流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脱巾而漉酒。欸乃和渔翁之唱,展廖听桑妇之歌。得与幸民共陶圣化!”^[1]卷三十九杨圭似乎满足于这样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了。然而,科举功名毕竟是古代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离官去职的遭遇,势必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无限的遗憾。真德秀《外舅生日设醮青词》说:

伏念臣晚叨末第,幸脱选坑。严邑黄岩,罪愆丛积。分司列院,斥罢不容。摧颓三黜之余,闲散十暮之久。虽自谗言之萋菲,实由己德之轻浮。幸皇天开改过之门,而列圣垂迁善之训。臣敢不省愆责已,涤虑洗心,赦其言之悔尤,原以取舍之差失。桑榆晚景,期体道之康强;桃李春风,保余生之清逸。^[1]卷四十九

“摧颓三黜之余,闲散十暮之久”,对于杨圭多次遭到罢斥,长期赋闲的仕途经历,诗中虽说了“实由己德之轻浮”“臣敢不省愆责已,涤虑洗心”之类自我归责的话语,但此乃正话反说,其不满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真德秀《七峰行为外舅寿》诗说得更加明白:

向来秀孕两宗工(原注:谓文庄与文公也),文章节操为世雄。百年山川久寂历,人物今有仙游翁。翁才古干将,翁目岩下电。千牛解剥刃有余,万象妍蚩镜中现。可持龙虎节,可运玉帐筹。才高惊众世弗售,祇令遗爱留丹丘。丹丘遗爱人人夸,经界宽租惠最多。后皇嘉之锡异梦,使汝有子登巍科。翁寿当万千,翁年才八十。视昔殷大夫,仅乃十之一。渭川出处付何心,独探玄关深更深。^[1]卷一

真德秀说,五峰七峰这些雄奇的山水,已经孕育了杨亿(文庄)、朱熹(文公)这样伟大的人物,沉寂了百年后,又孕育了仙游翁;其次用相对夸张的手法,赞美了仙游翁的卓越才干;再后接着说“才高惊众世弗售,祇令遗爱留丹丘”。丹丘,是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也就是说,杨圭仕途不得意,只好在道教修行中寻求精神的依托。而所谓“渭川出处付何心”,应该是用姜太公⁸¹岁才建功立业的事迹来为杨圭开解。

杨圭毕竟精通佛理,醉心道教。仕途的不顺遂,并不影响杨圭的身康体泰。真德秀撰的《辛卯外舅设醮青词》说:

伏以无德而寿,倏开九袞之期。不劳而官,将冒三阶之宠。顾臣庸昧,奋迹单微,早学古人,妄意寸功之及物;晚叨朝籍,止蕲一命之荣亲。虽中岁之险艰,而未涂之侥幸。迨衣冠之已挂,乃纶綍之屡颁。论议名官,行厕汉廷之干石;子男锡号,猥联周爵之诸

侯。虽朱幡画鹿之莫酬,而紫绶垂鱼之亦宠,凡兹命数,俱非始望之可期。况是年龄远过古来之稀有,自揆蠢愚之质,曷胜覆育之恩,爰即诞辰,谨修法醮,但知敬谢,何敢多求,视听俱全,愿保微躯之健,子孙浸盛,更全暮齿之荣。^[1] 卷四十九]

功成名就,恩荣有加,身康体泰,寿比南山。八十高龄,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也是少有的洪福。回想杨圭的这一生,甥舅二人得意满足之情,已是跃然纸上。

三、杨圭思想蠡测

在思想方面,杨圭表现出儒释道三教兼容的特点。这既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也与杨圭生活的地域有很大关系。就大的时代背景而言,经过隋唐时期的充分发展,儒释道三教并行、融合,已成为宋初学术发展的一种趋势。宋初士子,与儒释道都有很深的渊源。就地域文化而言,浦城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是福建取道江南、挺进中原的重要通路,因此也更容易得风气之先而兴盛发展起来,并由此造就了诸多的名门望族。这其中尤以浦城之杨氏最为显赫。真德秀跋《杨文公书玉溪生诗》称“国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庄公(杨徽之)及文公(杨亿)始。”^[1] 543]杨徽之,字仲猷,后周显德二年(955)进士,曾任翰林侍读学士,宋初官职兵部侍郎。杨亿,淳化中赐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兼国史官修撰,主修《册府元龟》,编《西昆酬唱集》,倡为西昆体,为宋初著名的文人。而将乐杨时,远赴洛阳,从学二程,归闽之时,程子遂有“吾道南矣”之叹。由此可见闽北文化之兴盛。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氛围之中,杨圭三教兼容的思想因此得以塑造。

在思想方面,杨圭早期表现出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取向。“早学古人,妄意寸功之及物”^[1] 807]“念圣门之仕,期于行义,君子之学,贵在及人”^[1] 卷三十九]等等思想,是杨圭积极从政的根本动力之源。而在黄岩县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正是其“平谷禄,施仁政”的具体措施。

据宋代学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方奉使”条记载:

《乙集》载莆阳方信孺出使事详矣,今又得之杨开国圭。圭尝与(原注:一作典)方始属(原注:句读有误),能言其与伪元帅辩难者甚至。方见元帅,元帅叱问之曰“前日何故称兵?今日何故求和?”词色俱厉。公从容对以“前日主上兴兵复仇,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为生民也。二者皆是也。”元帅笑而不复诘。开国乃文忠真公之外舅,尝对真叹息云“我辈更吃五十年饭(原注:时圭年五十),也不会如此应对。”^[1] 卷三]

方信孺,字孚若,宋兴化军(今莆田)人,据《宋史》本传记载,方信孺“有隼才,未冠能文”^[2] 12059]。开禧三年(1207)奉命出使金营,“自春至秋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敌”^[2] 12061]。此处所记载的是方信孺与金国左丞相、都元帅完颜宗浩的一段精彩对话。对于方信孺在与金人谈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机智善辩,杨圭十分赞赏。由此应该可以看出,杨圭在政治上应该也是力主抗金的,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

在佛教思想方面,杨圭集注了佛教重要典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对于般若学应较为熟悉。他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中说道“《金刚经》者,乃诸佛传授之心法。……至唐时,解注已有八百余家。心法隐于耳目之传,殃及后代儿孙,莫此为甚矣。窃以诸佛说法,不离自性。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吾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常见自心自

性,自修自度,不从人得,即是自性释迦,自心弥勒。先天地而不为始,后天地而不为终。”^[8]体现了禅宗自性成佛、自修自度的理性精神。“我佛大慈氏横说纵说,感应无边。如一月水万窍风,听其目取,悉皆充足,亦不过为众生解黏释缚,妄幻扫除,真实现前,还汝本来面目,而无一众生可度也。虽然,道本无言,言之则粗;禅本无说,说之则末。”^[9]之后更是引用了德山棒、临济喝、大愚三拳等诸多禅宗公案及禅师语录。但接下去的言论又是净土念佛之理念“仆曰此一卷经,穷乡委巷,匹夫匹妇,人人受持诵念……仆谓若参到无畏境界,则生死涅槃犹如空华,得马亡羊无非梦幻,三境九幽皆为净土……”^[10]体现了宋代禅净合流的倾向。这点,从杨圭所选编的注解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既选了不少禅师大德的注解,也选了净土宗王日休的注解,且比重都较大。

在道教方面,杨圭热衷于修道成仙,也有颇深的造诣。真德秀在《寿外舅杨开国》诗中说:

天公最啬是眉寿,七十从来已稀有。堂堂玉立仙游翁,岁比磻溪未华首。碧瞳射人双镜悬,晓窗贝叶声琅然。问渠那得许强健,阴功久在朱陵编。愿翁遨嬉更千岁,做尽人间方便事。却乘白鹤御丹鸾,直上紫清朝玉帝。^{[11] 卷一}

真德秀说,杨圭70岁了依然十分健朗,首无白发,双眼如电,音声朗朗,那主要是因为他日常坚持持诵佛经(贝叶是佛经的代称),尤其是注重道教的修行,“朱陵”即朱陵洞天,为道家所称三十六洞天之一,此处借指神仙居所。其中提到的磻溪,北流入渭水,相传吕尚(姜太公)垂钓于此而遇周文王。到了宋代,有一名士隐居于徽州境内昌源河畔一处名为“劳溪”的村庄,该隐士因慕名姜尚隐居的“磻溪”,遂改“劳溪”为“磻溪”。真德秀将杨圭与隐士并提,可见其具有共同的趣味。“愿翁遨嬉更千岁,做尽人间方便事。却乘白鹤御丹鸾,直上紫清朝玉帝。”更说明了其修道求仙的追求。真德秀《七峰行为外舅寿》诗又说杨圭“才高惊众世弗售,祇令遗爱留丹丘。”^{[12] 卷一}丹丘也是指神仙居所。这就是说杨圭怀才不遇,就将其精神寄托于追求修仙成道。“丹丘遗爱人人夸……独探玄关深更深。”可见杨圭的道教修为颇高,且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他还刊刻道教之《感应篇》施舍给众人,以广其流传,且还热衷于设醮。设醮,即建立道场祈求福祉,是民间很流行的一种习俗,用以驱邪祈福,是一较为隆重的道教仪式。举行斋醮时需要写祝文,这就是青词。真德秀有《外舅生日设醮青词》《辛卯外舅设醮青词》,都是为杨圭设醮而撰写的。

杨圭的《金刚经》集注中还引用了道教人物,虽然只有两处,但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处是在经题的注“仙游翁集英曰”中引“冲应真人周史卿作《杨亚夫赞解》云”^[13],细读内容可知这段不是注《金刚经》的,乃杨圭引用周史卿的话。另一处是第三分“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经文下之注文“证道歌曰‘达者同游涅槃路。’注云:涅槃者,即不生不灭也,涅而不生,盘而不灭,即无生路也。冲应真人周史卿对喫不拓和尚指香烟云‘要观学人有余涅槃,炉中灰即是;要观学人无余涅槃,炉中灰飞尽即是。’”^[14]笔者认为此处的“注云”后面之文字,乃是杨圭所作,他再次引用周史卿的话来注“涅槃”。因此,上述两次出现的“周史卿”都不能算《金刚经》的一个注家。周史卿,为杨圭之先贤,乃宋代浦城有名的道士。《大明一统志》卷七十六记载建宁府“仙释”有“周史卿,浦城人。宋元祐中遇异人得养生之要,隐油果山二十年,炼丹垂成,一夕风雷大作,丹已失矣。遂出神求之,谓妻曰‘七日复来’。有一僧劝其妻曰‘学道者,视形骸如粪土。’遂焚之。明日,史卿来,空中哑哑责其妻而去。”^[15]真德秀也撰有《周真人祝文》曰“谨以素饌,昭告于勅封冲应真人靖惠夫人曰:有崇斯山,作镇南浦。真仙宅焉,多历年所。庥吾一邦,厥施甚普。宝轴纶书,光贲琳宇。实帝令之,俾职兹土……”^{[16] 卷四十八}可见周真人对当地士人的巨

大影响。杨圭引用道家人物之言论来为《金刚经》作注,与他热衷于修道求仙有关。

综上所述,杨圭儒释道三教皆通,一方面他由科举出身,熟读儒家经典,关心民瘼,锐意改革,体现了儒家特别是宋代理学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熟知内典,念佛修禅,精通佛理;同时他还寄情山水之乐,热衷于求道修仙。他的思想体现了宋代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时代特点。杨圭以儒家为根基,同时又崇奉释、道两家的这种思想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编纂的《金刚经十七家释义》。

参考文献

- [1]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 [2] 佚名.尔雅[M].郭璞,注.王世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3.
- [3]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 [4] 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十九[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73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100.
- [5] 脱脱.宋史:卷四百三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 朱棣.金刚经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7] 李艺敏.朱棣《金刚经集注》之注家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 39.
- [8] 杨圭.十七家解注金刚经[M].明嘉靖四十年(1561)学易山人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 [9] 许明.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宋辽金元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929.
- [10] 林日波.真德秀年谱[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13.
- [11] 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2] 真德秀.西山文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7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3]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知不足斋本.
- [14] 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M].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浙江书局重刊本.
- [15]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16] 杨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解[M].明成继光校刊本.台湾图书馆藏.
- [17] 李贤.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1175.

责任编辑:陈小诗